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BEIJING SHIFAN DAXUE SHIXUE WENKU

近现代中国史学史论略

张越 著



商务印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近现代中国史学史论略

张 越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中国史学史论略/张越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13059-2

I. ①近… II. ①张…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
近现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403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近现代中国史学史论略

张 越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3059-2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42.00 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杨共乐

副主任：李 帆 易 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总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高校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百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赓、赵光贤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耘。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系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久已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成等，又有一批崭露才华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在教学方面，我系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重大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我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

史学的压轴之作”。其他教师的学术论著也多次荣膺国内外各类学术奖项,得到学界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业已铸就自己的辉煌,但学术的发展无止境。今天,中国社会政通人和,学术研究也日新月异,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更好地传承先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光大其传统,进一步推动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本系决定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陆续出版我系学者的学术论著,以集中展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整体学术水准。同时,相信这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向以奖掖学术、传播文化著称,此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的编辑出版,也承蒙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目 录

前 言	1
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	13
“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	54
20 世纪中国古代史领域重要理论问题研究述论	74
20 世纪《后汉书》和《三国志》研究述评	92
李大钊的学术贡献	112
回眸民国学术界对郭沫若史学的评价	126
选择与坚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顾颉刚(1949—1954)	143
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174
民国时期史学史略	189
当代中国史学史略	244
史学批评二题	315

从提倡国学到再倡国学

——国学与“国学热”刍议····· 326

近代以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提倡、弘扬与研究····· 344

近代历史研究与民族文化认同····· 368

论今文经学的变革思想对近代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 377

评李红岩著《史学史话》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 387

跨三代学者 筑学术基石

——简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399

如何研究与评价“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 403

宏大叙事之于历史研究不可或缺

——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 415

前 言

鸦片战争后,时局的变化影响到史学。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覬觐与蚕食,引发了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如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姚莹《康輶纪行》);有识之士因具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意识,出于借鉴外国历史以求自强的目的而尝试撰述外国史著作(如王韬《法国志略》、黄遵宪《日本国志》)。王国维说“道咸以降之学新”,他认为:“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①就是说,“道咸以降”之学术虽受到时代影响而“涂辙稍变”,但是总体表现仍是“承乾嘉专门之学”,即使“逆睹世变”而具有“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新意,也不过是区别于乾嘉考据而类似于“国初诸老经世之志”的经世致用之学。因此,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将晚清史学状况总结为:“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继续前此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加以补作或改作,对历代正史的表志,更用心地加以补充或修订。”^②这是符合当时的史学发展情况的。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别集》卷二十三,《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6页。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2页。

所谓“中国近代史学”，不仅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更意味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中国史学真正在历史观、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等学科自身领域方面有所触动、主动求新，大约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金毓黻说：“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革新期’”，“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本期学者，如章太炎先生，论史之旨，已异于前期，而梁启超氏，更以新史学相号召，而王国维氏，尤尽瘁于文字器物以考证古史，其他以西哲之史学，灌输于吾国者，亦大有人在，其势若不可遏，有中西合流之势，物穷则变，理有固然，名以‘革新’，未为不当”。^① 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都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先驱性人物，以他们为代表，中国传统史学从那时起逐渐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转变。梁启超率先明确提出了“新史学”。“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是贯彻进化论，“梁氏虽由经师弟子转变而为新史学家，但他的史学思想显然地受了今文学的刺激而接收进化论的史观”^②；特点之二是激烈抨击旧史学，梁氏《新史学》“对我国传统的史学作猛烈的抨击”，“这是新史学的第一声号角，这是对传统史学最严厉的批判”^③。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当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④

①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422页。

②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8页。

③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期，1949年10月。

④ 已有学者明确指出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对于中国史学的新旧转型意义。如王汎森说：“近代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革命，第一次史学革命是以梁启超（1873—1929）的《新史学》为主，它的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新史学的里程碑。”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6、7页。乔治忠也认为：“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兴起，是中国史学在主流意识上的巨大转变，可以视为史学近代化转型的开始。”见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如果从 20 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倡议开始算起,中国近代史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1949 年至今,或可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当代史学)。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史学,一直是在新旧史学、中西学术间寻找着自己的发展出路,历史与现实、学术与社会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史学面貌和错综复杂的学术谱系。对此,陆续有学者尝试从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潮的角度去分析总结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比较有影响的是冯友兰的“信古”、“疑古”、“释古”说和周予同提出的“史观派”、“史料派”。

冯友兰 1935 年说:“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他解释说:“‘信古’、‘疑古’、‘释古’为近年研究历史学者之三个派别,就中以‘释古’为最近之趋势。吾人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笔抹煞。若依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讲,则‘信古’、‘疑古’与‘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正’、‘反’、‘合’之辩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①顾颉刚对此说提出异议,1950 年顾颉刚在他撰写的“自传”中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来,乃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②从另一个方面说,冯友兰将“信古”、“疑古”、“释

^①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中国哲学史补》,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93、95—96 页。

^②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410 页。

古”三个派别的划分看作是“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也并不准确。古史讨论主要集中在上古史的史实问题和历代涉及记载上古史的文献真伪问题,从当时的情况看,对于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刚刚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或称近世史)研究以及孕育待发的“西洋史”研究而言,“信古”、“疑古”、“释古”之说并不完全适用。

周予同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年来国内治中国古代史的,大概可归纳为四派:一、泥古;二、疑古;三、考古;四、释古。”^①与冯说相比,此说被限定在“中国古代史”范围内,又增加有“考古”一派,考虑得更为周全。不过周予同在1941年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又提出了新的见解,将“转变期的新史学”分为“史观”与“史料”两大派别:“所谓转变期的新史学,可分为两类:一是偏重‘史观’与‘史法’方面的,一是专究‘史料’方面的。史法每原于史观,或与史观有密切的关系;为行文简便起见,前者可称为‘史观派’,后者可称为‘史料派’。换言之,中国现代的新史学家可归纳为两类,即‘史观派’与‘史料派’。”^②

民国时期还有人就史学派别提出自己的意见(如钱穆提出的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齐思和提出的掌故派和社会学派),但是

① 周予同在《暨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1期发表了《纬讖中的“皇”与“帝”》一文提出此说,文中写道“泥古一派,囿于旧说,除非别有用心,不足与谈学术。其余三派,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疑古失于臆断,释古流于比附。考古本治史大道,但也苦于狭窄,且不是每一学人所能从事。鄙意疑古和释古都应该有先驱的工作,考古也应该有辅助的工作。……疑古派的辨伪的争论,和释古派的社会决定的争论,都可以省下一部分无谓的浪费的气力,而考古派也正可以依据地下的遗物和这纸上的分析工作相呼应。”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页。

②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5页。

在后来真正产生影响的还是史观派和史料派之说。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以来,以史料派和史观派概括总结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尽管在表述上有些差异(史料派也有被称为近代实证史学、新历史考证学等),却已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同。随着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清末民国时期以史料派为主并伴随着史观派尤其是唯物史观史学的迅速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史学格局,逐渐清晰起来。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史料派和史观派的不同研究特征给近代中国史学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不同史家研究旨趣的追根溯源等一般和具体的问题,都在该研究格局中取得了明显的收获。

用某种较为固定的研究理念或研究框架看待学术史固然必要,事实证明用“史料—史观派”框架粗线条地勾勒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主要趋向也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史观与史料两派就能够涵盖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全部,也不意味着舍史观派和史料派而言便再无客观解释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其他模式。同理,若仅局限于使用“史料—史观派”框架解读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也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过分使用这种方法,则这些问题就显得愈加突出。

20 世纪前半期的史学派别有不少,如国粹派、古史辨派、史语所派、学衡派、食货派、禹贡派、战国策派等,虽然其中一些是以刊名称之,但是能够成其为“派”,其代表人物及聚拢在代表人物周围的学术群体,均有着较为一致的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而不是仅仅以史料考证为目的。20 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倡议的动因之一是要撰述新型中国通史,梁启超、章太炎虽未能完成他们自己的通史著作,通史撰述却成为中国近代史学中的学术基因,撰述中

国通史成为诸多近代史家的研究目标。著通史者,当或多或少地具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看法和赖以解释历史的理论观点。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年)也称《中国古代史》,被认为是新式中国通史的最早成果。民国史坛不乏通史撰述,而且蔚为大观,其中如吕思勉《白话本国史》(1923年)、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1934年)、张荫麟《中国史纲》(1940年)、钱穆《国史大纲》(1940年)等通史著作至今受到读者欢迎,而著者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人,同以史料考证见长。即使史料考证领域之翘楚王国维、陈垣,依然在史观、史法方面颇具洞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蕴含有关制度变化与时代转换的大问题,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中对传统校勘方法和避讳方法的总结,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一样,都将史料考证提升到了方法论层面。以上所言史家,如果按照“史料—史观派”的框架看,大多属于史料派,而就其在史学活动上表现出的多面性而言,实难为史料考证所涵盖。

民国时期史学以史料考证为主流,其原因既有提倡“科学”的历史学所带来的史学“求真”意识,也有新史料大发现和西方史学传入改变了传统史料观所带来的影响,另有经史转换之际留给近代史学的传统学术遗产。早有前辈史家论及五四前后走出经学羁绊的中国史学应以经学的材料作为史学的材料、以经学的考证方法作为史学的考证方法,梁启超、顾颉刚、吕思勉等史家认为“有意识地”以治经之法治史,柳诒徵列举三礼、古音、六书、舆地、金石等“一一如其法以治之”,应当是后人努力的方向^①。然而近代史学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衡》第64期,1928年7月。

对经学考证方法的承继只限于方法层面,既非历史研究的所有方法,更非历史学的全部。梁启超讲得十分清楚:“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①金毓黻也指出:“考证之学,本不能独立成一学科,而吾国之治经,即等于研史,不惟治经当用考证学,即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②即以“史料派”而言,从近代经史转换关系来看,这或许可以启发我们,仅以“史料”归纳为史学一派,从学科自身概念上看并不十分严谨。历史考证,本为史学研究的最基本内容,无史料不历史,无史观(史法)不史学。过分以“史料—史观派”框架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特别是简单化地以史料派和史观派的此消彼长来勾勒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变动特点,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对史料派或史观派的判断与评价,从而得出史料派缺少理论、史观派无视史料的认识。况且,从字面上的道理来看,史料派无史观尚可,因为它本来就是“史料派”,而史观派无史料则不能允许,历史研究怎能轻视或者忽视史料呢。这就预设了评价标准失衡的前提,再联系到特定的学术语境,形成了对史料派研究的重视并予以较高评价、对史观派研究的轻视并不断受到质疑的局面。这里便涉及唯物史观史学。^③

毋庸置疑,史观派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唯物史观史学,以至于人们通常就将唯物史观史学作为史观派的代名词。如果从1930年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5页。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397页。

③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称谓大约是1949年之后开始使用,1978年改革开放后较为流行,民国时期多称唯物史观史学、左派史学等。

出版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算起,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已有八九十年的时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后居主流地位至今也已经六十多年了,较之不到四十年的民国时期史学(止于1949年),前者至少在研究者的人数、已有研究成果的数量等方面都无法与后者相比。在“史料—史观派”框架中,存在着将二者对立起来从而先入为主地认定史观派轻视史料的可能,可实际情形却如戴逸先生所说:“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努力而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弟子,而黄侃又是章太炎的学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除学习了西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又和中国过去的乾嘉学派、公羊学派有密切关系。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割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地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①

唯物史观史学是用一种新的历史观解读研究中国历史的全新尝试,在对史料的运用方面出现问题毋需讳言,更应该被重视的是其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创新意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张荫麟评价为“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②。郭沫若在该书“自序”中明确肯定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用新史料研究中国古代的成绩,坦言“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③,他认为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代表的研究路数是“社会的来源既未

①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1932年1月4日。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批评胡适的书“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①顾颉刚回应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②郭沫若肯定罗、王的史料考证之学并明言以之为“出发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具有“例示研究古代的一条大道”的意义,这里看不出史料派与史观派的明显区别,看到的是在学术上的传承联系与基础上的学术创新。林甘泉先生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各种学术流派的评价,要持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带政治偏见。如果说学术的发展需要宽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见,那么这种宽容和尊重是双向的。”^③不回避缺点与局限,也不忽略既有的学术价值和成就,应是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学术流派的基本态度。

唯物史观史学起步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其建立的标志。社会史论战期间,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大都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性质,目的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政治问题。唯物史观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和重庆地区得以迅速发展,此前参加社会史论战的许多人因为政治原因远离或放弃了用唯物史观观察中国历史的研究路向和研究方法,延安和重庆两地研究者的政治立场趋同——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构成。他们完成并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为代表,唯物史观史学发展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7页。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7页。

③ 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